

任弼时在江西

主 任:苏多寿

副主任:曾宪林 王瀚秋

编 要: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诗平 王瀚秋 卢大有 汤静涛

朱德久 苏多寿 宋允平 梅 宏

曾宪林 熊 敏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任弼时在江西/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曾宪林主编.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03

ISBN 7 - 210 - 02877 - 3

.任中 .任弼时(1904—1950) - 生平事迹 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6412 号

任弼时在江西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主编 曾宪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7.5
字数:200 千 印数:1 - 1100 册
ISBN 7 - 210 - 02877 - 3/K·341 定价:15.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邮政编码:330002 传真:8511749 电话:8511534(发行部)

E - mail: jxp-ph@163 .net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前言	1
一、漫漫苏区路	3
二、全权处理“ 富田事变 ”	9
三、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
四、留守苏区后方	27
五、筹备召开“ 一苏大会 ”	35
六、“ 赣南会议 ”期间	46
七、布尔什维克组织家	58
八、“ 宁都会议 ”前后	74
九、调赴湘赣苏区	98
十、初到湘赣边	109
十一、一切从实际出发	117
十二、君独能兼听	122
十三、殚精竭虑开好两个大会	129
十四、致力于苏区经济建设	134
十五、保护和关怀干部	139
十六、一丝一毫不能特殊	146
十七、运筹于帷幄之中	150

十八、率部西征突围 160

回忆与悼念

永远的怀念 方志纯 168

革命的良师 刘俊秀 177

任弼时同志与湘赣根据地 王首道 183

湘赣省第三次党代会前后 王恩茂 192

忆在瑞金中央党校学习的日子里 萧 锋 195

我给任弼时抬担架 毛少先 200

任弼时同志出席兴国团代会 周爱民 205

悼弼时 萧劲光 209

怀念任弼时同志 张爱萍 212

悼念任弼时同志 王 震 215

纪念任弼时同志 李 立 219

爸爸对我们的言传身教 任远远 222

任弼时在江西大事记 226

后记 246

前 言

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奠基者。任弼时从 1920 年 16 岁时参加革命，至 1950 年 46 岁时逝世，在整整 30 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革命业绩和崇高风范，永远铭记在我们党和人民的心中。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弼时在江西这片红土地上度过了一段很不寻常的岁月。在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留下了他的亲切笑容和闪光足迹，记载着他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与光辉的业绩和宝贵的经验教训。

1931 年 3 月，任弼时肩负重任从上海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副书记、代理书记等职。他为苏区党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33 年 5 月，受博古等排斥，被免去了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调赴湘赣苏区，担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

1933 年 5 月至 1934 年 7 月，任弼时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为湘赣苏区党、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表现出优良的思想作风和卓越的组织才能。1934 年 8 月，在他的率领下，红六军团告别湘赣苏区开始突围西征。

任弼时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无限忠诚，把自己的全部精力

和生命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他具有高度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他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善于正确处理和解决复杂的重大的问题;他对党的组织工作、军队政治工作、青年工作和财政经济工作都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善于团结同志,关心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遵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尊重集体领导,富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生活上一贯艰苦朴素,克己奉公。

纪念任弼时,就是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拓进取,求真务实,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漫漫苏区路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公共租界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的一幢西式楼房里秘密召开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操纵下,借口瞿秋白、周恩来主持的六届三中全会犯了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错误,把一个毫无实际工作经验的、搞教条宗派的王明扶上台,不仅把他增补为中央委员,而且安排他担任政治局委员,让他实际操纵中共中央领导权。在这次会议上,任弼时也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六届四中全会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给远东局拍来一份电报,明确要求尽快成立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而且都要建立在赣南。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向中共中央传达国际执委会电报的同时还提出:中共中央从政治局起,以百分之六十的干部派去巩固苏区的领导,尽早成行。中共中央对来自共产国际和远东局的指示,立即认真研究,积极贯彻执行。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县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一号》宣布中央局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一人,共青团中央一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在周恩来未到职前,暂由项英代理书记,而此时在苏区工作的只有项英、毛泽东、朱德、曾山四人。中央局虽已成立,但在组织上尚不健全。

1931年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去中央苏区人选

时,任弼时建议:中央苏区任务重,“过去分配的力量不足”,如周恩来去苏区有困难,最好另派一名政治局常委去;王稼祥必须和他一起去中央苏区,以便加强理论指导工作。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为加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增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去苏区中央局工作;并决定由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顾作霖和苏区一人共七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四人为常委;项英任代理书记,任弼时负责组织(后任组织部长),王稼祥分管宣传(后任宣传部长),毛泽东负责军事。

193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中央代表团,任弼时为代表团负责人,前往中央苏区,负责向苏区党组织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并代表中央对“富田事变”作全权处理。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中央代表团须立即动身前往中央苏区。

27岁的任弼时,深感肩上的担子很重。他长期在白区从事城市秘密工作,对农村工作和割据区域的军事斗争没有实际的经验。面对这一全新的而又非常复杂的工作,党性很强的任弼时坚决服从了组织决定,踏上新的征程。

3月7日,任弼时同王稼祥、顾作霖一起离开上海,沿着中央交通局开辟的秘密交通线,奔赴江西中央苏区。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由中央交通局开辟了一条由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进入江西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负责传送党中央和苏区之间来往的文件,运送苏区急需的物资和党的经费,并担负着护送党的领导干部的任务。

为了安全起见,任弼时和王稼祥从上海出发时化装成牧师,顾作霖则化装成工人。任弼时身上携带着两份党的绝密文件:

中共中央初步拟定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候选名单和用于电报联系的密电码。名单用密写药水抄写在一件白衬衣上；密电码则密写在一本《圣经》里。他们三人由中央交通局大埔交通站地下交通员护送，秘密登上美国邮轮“麦迪逊总统号”。

汽笛一声长鸣，邮轮起锚离开码头，向近海驶去。遥望着万家灯火的上海，任弼时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于1920年16岁时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被党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冬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24年夏奉调回国后，在上海的青年团中央和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在党的五大、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期间，他曾先后两次被捕，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被组织营救出狱。

上海，是他工作、战斗多年的地方。此行本来妻子陈琼英应该与他同往，然而陈琼英即将临产，只好留在上海。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分别。临行前，看着瘦弱矮小的妻子挺着大肚子的艰难样子，任弼时很是心疼，他深情地说：“琼英，本来你应该和我一起走，可是，你的预产期快到了，万一途中分娩，路上行程曲折，对你和孩子都不方便，只好暂时让你留下了。临产时，组织上会派人来照顾你的。”你放心上路吧！”陈琼英宽慰任弼时说：“只是……你得先给孩子起个名字。”任弼时想了一下说：“那就叫远志吧！一来希望孩子长大后有远大的志向；二来也是纪念我这次远行，你看好不好？”陈琼英点了点头说：“这个名字好，男孩女孩都合适，还有纪念意义。”最后，任弼时叮咛道：“明天你就不要来送我，免得发生意外。”任弼时离开上海七天后，陈琼英生下女儿“远志”。

蓄着小胡子的任弼时穿着黑色长袍，脖子上挂着耶稣基督受难的十字架，与王稼祥、顾作霖一起坐车来到上海16铺码头，任弼时提着轻巧的小皮箱，举止庄重，不苟言笑，登上舷梯，大摇

大摆地走进邮轮的头等舱位,前往香港。

经过数十个小时的颠簸,邮轮抵达香港。任弼时一行在上海启程之前,中央交通局通过秘密电台已将人数、姓名、性别、政治情况、接头暗语等通知香港交通站。到香港后,一切情况正常,便由香港交通站的交通员带路坐轮船到广东汕头。汕头交通站租用的一座三层楼房,面临马路,离海边码头不远,挂的招牌是“华富电料公司”。站长陈彭年,公开身份是老板。有两个交通员,一个叫顾玉良,公开身份是会计,另一个是罗贵昆,公开身份是职员。

任弼时一行抵汕头作短暂逗留后,又由汕头交通站的交通员带领,换乘小火轮溯韩江而上直抵大埔。小火轮停下后,大埔地下交通站把预先安排好的小木船靠拢过来,由交通员把任弼时一行接到自己的木船上,再逆流向上行 15 公里,便到达闽粤边境的青溪乡。木船靠岸前,青溪交通站派武装人员接应,在城郊沙坝江边等候,见来了船,便立即发讯号,用暗语唱出客家山歌来。船上的交通员听到歌声,知道是自己人在接应,便加紧靠岸,安全渡过关口。上岸后,任弼时一行即由武装交通护送,步行越过国民党军封锁线,进入福建永定的游击区。为了安全起见,任弼时一行每个人都准备了一套对付敌人盘查的说辞,而且日夜兼程。

1931 年 3 月 15 日,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到达闽西苏区永定县的虎岗。虎岗位于永定县与上杭县、龙岩县交界处,是一个地势险峻、青山环抱、绿树掩映的山村。这里是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一进入苏区,眼前的一切都是那样新鲜,处处充满生气,任弼时十分兴奋。他敬佩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创造。他说:“这才是我们自己的地区。”在虎岗,任弼时遇到了曾两次赴莫斯科学习,1930 年回国后就来到这里担

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的萧劲光和受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委派到江西苏区作调查的中央军委秘书欧阳钦。

时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书记的邓发,热情地迎接任弼时一行的到来。任弼时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向闽粤赣边区特委传达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江西苏区 AB 团及富田事变的处理决定。在虎岗停留期间,王稼祥还和萧劲光一起去观看了部队的军事演习。这时,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即将开始,闽西苏区战幕已经拉开。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偕欧阳钦离开虎岗北行。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命令正在石城县活动的红十二军派出一个主力团赶到长汀县南部的四都迎接并护送中央代表团。任弼时沿途利用休息时间,向苏区群众和干部了解苏区工作的实际情况,思考着如何尽快地向中央苏区的同志们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如何圆满地处理好富田事变问题,如何早日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建立起来。

任弼时一行经长汀的四都坪于4月4日到达江西瑞金的大柏地。到大柏地后,改由一个排护送去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所在地宁都县的青塘。4月17日,任弼时赶到青塘和毛泽东、朱德、项英等见面,当即参加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主持会议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央代表团成员。大家鼓掌,热烈欢迎代表团的到来。毛泽东向中央代表团汇报了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过和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情况。接着,任弼时和王稼祥分别传达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时局的估量及中央关于“富田事变”的处理意见。会议通过《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等5项决议。

任弼时在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苏区中央局组成

人员及分工决定,与会同志都表示拥护。毛泽东发表意见说:苏区中央局是负责领导苏区工作的,应该增加长期在苏区和红军中从事实际领导工作的同志,他提议增选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和陈毅等五人为中央局委员。毛泽东的提议得到大家支持。选举结果,一致同意,任弼时表示:新增选的五位中央局委员,需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但可先参加中央局的工作。

4月18日至19日,扩大会议在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一些同志主张“跑”,跑到四川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另外一些同志提出“分兵退敌”“削萝卜”的主张。毛泽东和朱德则力主集中兵力,就地打破敌人的“围剿”。严重的意见分歧,使苏区中央局无法作出决定。经过充分讨论,中央代表团和大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朱德的正确主张,最后决定集中兵力,在中央苏区内作战,粉碎敌人的“围剿”。

二、全权处理“富田事变”

任弼时率领中央代表团来到中央苏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全权处理“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于1930年12月12日,是赣西南苏区因肃AB团引发的一起严重事件。

所谓AB团,原是蒋介石在1926年冬为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手中夺取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领导权,而指示国民党中央特派员段锡朋等人组织的。它是一个反共反人民的组织。1927年1月,在蒋介石支持下,AB团果然篡夺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领导大权。

为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1927年4月2日,中共江西区委在朱德领导的南昌军官教育团进步军官等革命组织的支持下,发动南昌人民举行大暴动,一举打散了AB团把持的省党部,捉拿了AB团骨干分子30余人,缴了省党部纠察队的枪械。4月3日,省、市200多个团体、3万余民众在南昌市皇殿侧体育场批斗、公审了AB团骨干分子程天放等人,庆祝摧毁AB团省党部的胜利。从此,一些残余的AB团分子虽潜往江西各地或外省市活动,企图死灰复燃,但其组织始终未恢复。他们的一些零星活动,也转化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

但是,中共江西省委乃至中共中央,并不了解AB团组织解体后不复存在的真实情况,一直误认为AB团组织仍然存在并还在活动。再加上此时党内“左”倾错误思想逐渐抬头,党中央

将“第三党”、“改组派”与 AB 团等统统列为“最危险的势力”，要求全党坚决与之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对 AB 团始终十分警惕的江西共产党组织，更是密切关注着 AB 团的动向。1930 年 5 月，中共赣西南特委便声称发现 AB 团分子混入了共产党内部并做了中共的支部书记。随后，中共莲花县委、安福县西区以及纯化、兴国、桥头等地，均称发现 AB 团已混入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内部，并已开始了肃 AB 团的斗争。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赣西南苏区在肃 AB 团的斗争中，不注重调查研究，只是捕风捉影，听信口供，而且滥施酷刑，专靠刑讯逼供，强迫被捕之人供认出 AB 团成员。对被供认出的所谓 AB 团成员，又随意杀戮。这样，就使赣西南苏区迅速刮起乱捕滥杀 AB 团的风暴，使 AB 团成员越打越多。

1930 年 10 月 4 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军团攻占吉安城。红军入城后，赣西南苏区领导人李文林等，向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汇报了关于整肃 AB 团的情况，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毛泽东指示要在苏区继续开展肃清 AB 团的斗争，并要求在红军部队中也要开展这一斗争。根据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指示，1930 年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各部队在宁都县黄陂开展了以整肃 AB 团为主的大规模“肃反”运动。几十天之内，红军中就有 4000 余人被打成“AB 团”分子。

1930 年 12 月 7 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黄陂肃反”中得到的口供，派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带着红十二军 1 个连，前往吉安富田，捉拿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十军中所谓 AB 团骨干分子。李韶九是个品质很坏的人，在富田又乱搞逼、供、信，乱捕滥杀，造成恐慌。为制止李韶九继续乱捕滥

杀,救出被李韶九抓捕关押的所谓 AB 团骨干分子,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带领一七四团一营,在东固抓了支持李韶九肃 AB 团的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并连夜从东固冲到富田,包围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扣押了正在审讯 AB 团的李韶九(李后逃脱),放出了被作为 AB 团分子关押的人员。随后,召开控诉大会,在会上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错误口号。大会后,事变领导人率领红二十军离开富田等地,西渡赣江,开到赣西的永阳镇。沿途,他们继续张贴反毛分裂标语。

这就是震惊赣西南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富田事变”。

很显然,赣西南苏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 AB 团组织,更不存在所谓 AB 团打入共产党和红军组织内部的事实;“富田事变”不是 AB 团领导的,事变领导人同 AB 团毫无关系,更不是什么 AB 团分子;“富田事变”的发生,是由肃反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尤其是李韶九等人严刑逼供直接引发的错误的武装对抗行动,而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的暴动。当然,不可否认,“富田事变”虽不是 AB 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但确实犯有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

但是,“富田事变”发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却将事变定性为“AB 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行为,是 AB 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

“富田事变”发生后不久,项英便来到赣西南苏区宁都县小布,成立了以他为代理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处理“富田事变”过程中,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对事变定性、事变的起因、事变发动者和领导者是否都是 AB 团取消派以及对赣西南苏区和红一方面军打 AB 团的具体做法等方面,都产生了意见分歧。苏区中央

局在 1931 年 2 月 19 日发出的第十一号《通告》中指出：

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够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 AB 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 AB 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已是自觉的与 AB 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

基于这一认识，项英主张用教育的方法、理智的方法、会议的方法解决党内已经激化了的矛盾。为挽救教育富田事变发动者与领导者，教育挽救所有犯错误的同志，同时为着教育全党同志，苏区中央局先后发表了《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和《告全党同志书》。在组织处理方面，“中央局决定将富田事变的首领段良弼、李伯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等开除党籍”，同时“议决开除李韶九同志的党籍（虽然后未执行），对于参加富田事变的人或开除或警告”。项英还亲自给有关人员写信做工作，教育他们抛弃原来的错误观点和立场，迅速转变到党的立场上来，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并派出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等过河到赣西苏区，向事变领导者和参与者做说服教育工作；通知整肃 AB 团的领导人和“富田事变”领导人，双方都到苏区中央局驻地宁都来开会，用会议的方法，分清是非，解决问题。

苏区中央局的上述做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对苏区中央局的上述处理主张不以为然，认为项英没有魄力，“完全是调和路线”，仍然坚持总前委的定性意见。苏区领导层的两种不同意见，一时难以统一。

“富田事变”发生后,事变有关的另一方,也派出原少共赣西南特委书记段良弼,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控告”总前委,请求对事变进行处理,同时给党中央送去了黄金。

段良弼于1931年1月中旬抵达上海的。任弼时代表中央接待了他。段良弼向中央递交了近万字的书面材料,汇报了“富田事变”前后详情,并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请求中央处罚。与此同时,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刘敌,也于1931年1月11日向中央写了一封近4000字的长信,汇报了他发动“富田事变”的原因和经过,表示紧跟党中央坚持革命,请中央给予严重处罚。事变领导人还以江西省委名义,于1931年1月12日给党中央写了报告,用大量事实揭露了李韶九的错误,详述了“富田事变”经过和事变后省行委与红二十军的活动情况及工作布置。

任弼时听了段良弼的申述后,先向中央政治局做了汇报,并将段良弼等递交的材料交由政治局同志传阅。

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赣西南苏区发生“富田事变”的问题。会上周恩来提出:应立即去一训令,要事变有关双方停止争论,一致向敌人作战。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等组成一个小委员会,对“富田事变”问题进行研究后,将意见报告给中央政治局。2月20日,这个委员会在综合研究各方面材料后,向政治局报告,认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反AB团的斗争是正确的,赣西南的AB团确是反革命组织,但从阶级成分上看,尚有动摇及红军中不坚定分子,在客观上亦可为AB团利用,这一点可以肯定;至于肃AB团的方法是否妥当,还不能作任何结论。中央政治局授命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到苏区后,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后全权解决,并委托任弼时代中央起草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及江西党组织的指示信。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在听了